

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好的政治应该是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的政治。

“真理”与政治

——写于《真理报》创刊90周年

□唐士其（北京）

《真理报》1912年5月5日在列宁主持下创刊于彼得堡，十月革命之后长期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真理报》发行量在80年代末达2000万份，但随着1985年之后改革的开展，发行量逐年下降，到1990年已经降到700万份左右。苏联解体后，随着苏共被解散，《真理报》也被查封。1992年，《真理报》产权被两名希腊商人买下，但发行量急剧下降到20万份，以至到1996年7月3日正式停刊。

此后，《真理报》原编辑部部分人员在重新建立的俄共支持下再次出版这份报纸，但影响力已根本不能与苏联时代同日而语。

可以说，《真理报》见证了苏联的整个历史过程，也是这个过程的缩影，而透过它的命运，人们也许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来探寻苏联兴亡的内在逻辑。

早期的《真理报》

《真理报》创刊之后，作为一份公开的工人阶级的报纸，它主要有两个内容，即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方针，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处境和他们所发动的斗争进行广泛报道。

就前一方面而言，列宁等党的领导人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分析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阐释党的行动纲领，仅列宁就在《真理报》上一共发表过280多篇文章。在后一方面，列宁曾经表示：“工人报纸是工人的讲坛。应该在这里向全俄国不断地提出工人生活问题，特别是工人民主的问题。”每份《真理报》上都刊登数十篇工人通讯，在其创刊后两年多时间内，共发表工人通讯1.7万多篇。此外，《真理报》对俄国农民的处境也予以密切的关



它曾经探索过真理，体现过真理，也曾疏远与压制过真理。图：本刊资料

注，发表了大量的农民通讯。因此广大民众把《真理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报纸，发行量和影响力在创刊之后迅速扩大，在1914年夏天被沙皇政府查封之前，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了4万份。

1917年2月革命之后，《真理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和发动群众、向他们指明革命的发展道路并动员他们支持的武器。十月革命指导原则《四月提纲》就是1917年4月7日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的。

应该说，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斗争中，《真理报》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的宣传、发动作用，完全是依靠这份报纸自身的吸引力，因此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压制与迫害，但总是体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每次被禁之后，它都会以一个新的名字重新出版。（《真理报》先后使用过的名字有《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

《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真理小报》等）

十月革命胜利后，《真理报》正式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强调新闻舆论工具的党性和阶级性，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在1921年8月针对一直坚持主张出版自由的米雅斯尼科夫的处分决定，明确反映了这一原则，一些被认为不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言论被拒绝在《真理报》上发表。但尽管如此，在斯大林完全控制党的权力之前，《真理报》仍然为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供了一定空间。1922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性质的争论，1923年由布哈林发起的关于苏联经济建设方针的大争论，在《真理报》上都有相当反映。

可以这么认为，在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确立之前，以《真理报》为代表的苏联媒体一方面发挥了党宣传、团结、

教育和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不违背党的基本纲领和路线的前提下，为不同观点提供了一个争论的公开场合。《真理报》并不是真理的化身，却提供了通往真理的道路。用布哈林在《政治遗嘱》中的概括来说，就是“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又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真理”与谎言之间

1923年开始的关于苏联经济发展方向的争论以斯大林的胜利而告结束，苏联由此走上了加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真理报》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主编布哈林被解职，后来又被逮捕并被处死，这份报纸变成斯大林向全党宣传自己观点，并对反对者进行批判和攻击的武器。《真理报》角色的这一转变，其实只是苏联整个社会巨大变化的缩影，同时也是斯大林对苏联社会全面统治确立之下的结果。

斯大林是通过在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清洗”完成了这一空前绝后的任务的。清洗过程始于1930年12月他接见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成员的秘密讲话。讲话内容包括对当时苏联思想文化领域形势的估计，也包括斯大林本人对文化活动的性质、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的认识。总的来说，就是反动派在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一种“微妙的统治地位”，思想文化活动必须同党内的政治斗争以及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其主要任务是展开全面批判、采用的方式则应该是“全面进攻”。这里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斯大林所说的批判是有特定含义的，是对当时所存在的思想文化成果的批判，是为了树立新权威而对旧权威刻意进行的批判，是在达到目的之后必须马上变为歌颂的批判。

大批判的结果是对当时苏联文化各个领域内的权威人物的思想和学术地位、甚至是肉体的消灭，同时斯大林本人则变成人类思想一切领域最高与最后的权威。数不清的令人肉麻的溢美之辞被堆到他头上，诸如“天才的导师”、“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一切时代科学的泰斗”、“永

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甚至“斯大林就是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等等。斯大林由此成为真理化身、成为判断对错的唯一标准，其结果就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年代，被认为是真理的不是那些符合实际和经过实验的东西，而是那些经过‘斯大林同志’所肯定的东西”。（罗伊·梅德韦杰夫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什么思想文化活动的活动，那也只能是斯大林一个人的活动，其他人的任务则是对他的思想进行领会与执行，因此鹦鹉学舌、千篇一律自然成为包括《真理报》在内的苏联各种媒体的最大特点。在这一片毫无意义的

苏联解体之前，在群众中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真理报》不讲真话，《消息报》里没有消息。”

重复之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创造”，那就是对个人崇拜的创造。1929年12月，《真理报》为庆祝斯大林50诞辰，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用大量篇幅发表来自全国各地的颂扬文章，到他70岁诞辰时，这份报纸上更是出现了一篇奇文：“如果你在斗争中或工作中遭到了困难，一下子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怀疑——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立刻就会获得必要的信心。如果你在不该疲劳的时候感到了疲劳——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如果你想找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这一决定……斯大林说什么，就意味着人民在想什么。”

当然，在斯大林之后，情况有一点好转，出现过短暂的被称为“解冻”的文化

现象，官方舆论工具中时而还会出现不同声音。196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过分突出自己时，《真理报》便发表了题为《集体性和责任》的文章，提醒说“只有当对权威的尊重不超过合理的界限，党委会的书记们具备为集体的交换意见所必需的机智、谨慎和自我批评精神时，集体精神才能够得到发扬”。这是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射。但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且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尚未巩固或者受到威胁的体现，一旦他牢固控制了局势，情况就会迅速改变。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3年后，即1969年《真理报》的主编A·鲁米扬被解职一事，其原因就是他发表了《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该进一步处理好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对艺术创作进行“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

在斯大林体制下，人们阅读官方出版物，除了了解最新的政策动向，以及透过各种报道的字里行间判断人事变动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苏联解体之前，在群众中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真理报》不讲真话，《消息报》里没有消息。”有一个笑话是关于《真理报》的，说的是十月革命前，人们聚集在一起阅读《真理报》时总要准备好伏特加，以便宪兵来的时候伪装群众狂饮的样子；而在戈尔巴乔夫禁酒运动期间，人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总要准备好《真理报》，以便警察来的时候伪装成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样子。当然不是只有《真理报》遭到人们的嘲弄，但作为苏联媒体的象征，人们对它的态度是对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态度的集中反映。

政治中的真理与真理中的政治

高度的政治化是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在这种体制下，思想文化领域的所有现象都被看成是政治问题的反映，而所谓政治方法，即强制的方法，也被简单地拿来解决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从1947年底开始的《真理报》及其他报刊对遗传学中的“反动派”的狂轰滥炸就是一例；在这一年7月31日开始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特别会议期间，《真理报》和苏联其他报刊

上专门对那次会议进行报道的“今日生物学”专栏占据了任何一则新闻（包括柏林问题）都无法相比的篇幅，批判者们的言辞和逻辑更达到了荒唐的程度，比如有人表示：“战争尚未结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们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这些人中，就有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代表们……”

泛政治化加上极端的个人崇拜，给苏联的思想文化活动带来了巨大灾难。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1936年首演一个星期之后，《真理报》上突然出现了一篇社论《混乱而非音乐》，把这部歌剧说得一无是处，据称这篇社论几乎就是斯大林本人对该作品的评价。党的中央机关报对一部普通音乐作品发表这么一通不着边际的评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不是可笑的事情，因而肖斯塔科维奇本人在看到这篇社论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收拾好行装，准备被逮捕或者流放。类似的事情，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也曾经发生过。

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提出了一个

问题，即政治与真理的关系，亦即政治中的真理和真理中的政治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传统上把政治理解为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至于真理，则被理解为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从而与错误之间也存在一种你死我活的对立。这种理解很容易地把政治问题等同于真理问题，把对错关系等同于敌我关系。


但政治过程不同于真理过程，就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判断对与错，而是需要协调，需要创造出时间与条件，让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们达成一致。甚至政治中的妥协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与错之间的调和。西方人常常说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本质中的某个方面。如果考虑到掌握着权力的一方并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对所面临的问题都得到正确恰当的理解，政治中的宽松和容忍就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一种好的政治应该是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的政治。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巴特金曾说过，在斯大林体制下，“政治消失了，因此一切成为政治”。这意味着“党已经不领导任何人

也不领导任何事了，因为在我们社会里，基本上没有了可以领导的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事是不能靠简单下命令的”。巴特金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即当一切成为政治时，亦即一切都以强制方式进行的时候，政治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至于在真理过程当中，则更是不能混杂政治的因素，因为作为一种知识过程，既不能通过消灭对方获得自己的正确性，也不存在对不同观点之间的刻意协调，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不同观点和立场公开的平等的对话和论争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斯大林模式在权力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以权力裁判真理，又以对错简化政治。至于建立在谎言和欺骗基础之上的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则更具爆炸式的危险性，曾经在1936年访问苏联的法国共产党员纪德曾经指出：“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然而一旦人们了解了事实真相，这种所谓的幸福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倒掉。在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时，其思想文化体制所暴露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步阳集团
CHINA · BUYANG GROUP

门业世家 传承经典品牌的呵步

步阳 呵护您的家园

绝不妥协于任何一个细节

半轻若重以达极致

千锤百炼方臻完美

化科技入日常 凝心血成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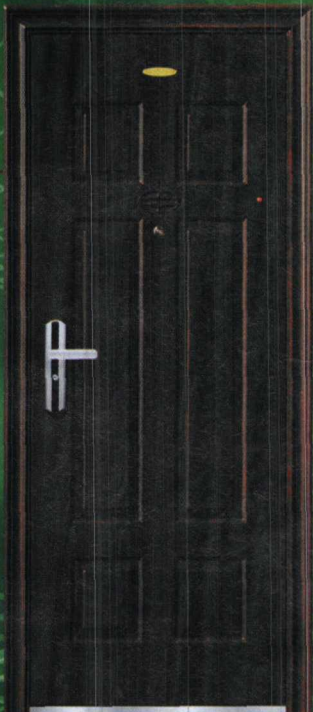
严谨不苟的专业情操

与颠覆陈规的超前勇气合而为一

步阳防撬门

一种执着 一种信念

科技 又不仅仅是科技



全国统一免费售后服务热线：8008579388

步阳广告片正在央视1、2、4、8频道热播

诚邀实力派商界精英加盟合作，共享双赢

中国·步阳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汤店山工业园88号

服务热线：0579-7271336 7271316

<http://www.buyang.com> E-mail: ykbuyang@mail.jhott.zj.cn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